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3 年 12 月 28-29 日)

1、《国会山报》：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复杂化 2024 美国大选

12 月 25 日，美国《国会山报》网站刊登政治内容记者朱莉娅·穆勒（Julia Mueller）、竞选内容记者贾里德·甘斯（Jared Gans）的文章《人们越来越担心人工智能对 2024 年大选的影响》。文章认为，美国 2024 年初选临近，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影响大选引发关注。人工智能可以生成文本、图像和音频，以及深度伪造视频，可能会在已经两极分化政治格局中传播虚假信息，并进一步削弱选民对美国选举制度的信心。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临时院长伊桑·布埃诺·德·梅斯基塔（Ethan Bueno de Mesquita）表示，2024 年将是一场人工智能选举，就像 2016 年或 2020 年是一场社交媒体选举一样。如果选民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获取有关选票、日历或投票地点的信息，机器人可能会为选民生成误导性信息，而且人工智能可能会被更“邪恶”地使用，制造并传播针对候选人的虚假信息。民调显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不仅仅来自学术界，美国民众也似乎越来越担心该技术可能会让充满争议的 2024 年大选更为混乱或复杂。美国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分校与美联社 11 月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

现，两党中多数美国成年人都担心人工智能在 2024 年大选中“增加虚假信息传播”。人工智能可以在选举周期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告知公众他们可能在哪些议题上同意哪些政治候选人，以及帮助选举官员清理选民名单以识别重复登记。但他们也警告称，该技术可能会加剧 2016 年和 2020 年大选中暴露的问题。

<https://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4371959-ai-artificial-intelligence-2024-election-deepfake-trump/>

编译：和怡然

2、《报业辛迪加》：联合国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五项目标

12 月 21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执行委员会委员卡梅·阿蒂加斯（Carme Artigas）等评论文章《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必须做到哪些》。文章认为，只有联合国拥有进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与包容性，联合国也将在未来人工智能治理中贯彻以下五项原则：一是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应因地制宜。应根据世界各地的不同情况制定独特解决方案，否则会造成风险与不平等的加剧。二是人工智能治理服务于公共利益。应切实保证公平、可持续性、个人福祉以及健康竞争，确保人工智能为社会发展服务。三是人工智能监管应协调不同国家监管框架。汲取各国监管政策智慧，确保以全球方案应对全球挑战。四是人工智能发展应与个人隐私保护齐头并进。需要增强相关监管

机构以确保人工智能不会侵害个人权利。五是人工智能治理应以国际承诺为基础。《联合国宪章》、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人权法等享有广泛认可的国际承诺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基础。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i-governance-un-advisory-body-five-principles-by-ian-bremmer-et-al-2023-12>

编译：高隆绪

3、《外交事务》：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探索尚未成熟

12月21日，《外交事务》网站刊登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国际政策主任、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政策研究员马里耶·沙克（Marietje Schaake）的文章《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探索尚未成熟》。作者指出，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引发了各国广泛关注。从G7人工智能行为准则到英国主办的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人工智能监管取得一些进展。一些倡议呼吁建立“人工智能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for AI）。而目前，仅仅是成立一个新机构并不足以解决人工智能治理的难题。企业倡议和不具约束力准则可能无法确保合规，OpenAI的尴尬境遇便体现了内部机制的脆弱性。有效的监管机构需要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确保公司和国家行为体对其行为负责。其次，法律应当为人工智能监管设定前提条件和内容，而监管机构应在其监督下执行这些法律，不能本末倒置。然而，过度依赖现有多边机构的经验不足以应对人工智能的全新

挑战。人工智能治理需要新形式的国际监管模式。同时，为防止传播虚假信息，法律要求公司透明化人工智能的作用。重要的是，监管应该考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资源消耗等环境保护问题。最后，政府应该在国际上达成共识，建立规范和标准，明确人工智能的法律义务。不同国家的法律将影响人工智能公司的行为，因此国际监管需要达成全球一致。作者认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探索不应操之过急，历史是宝贵的指南，不是捷径。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premature-quest-international-ai-cooperation>

编译：刘嘉雯

4、《国会山报》：美国需在 2024 年优先解决三大人工智能紧急问题

12 月 23 日，《国会山报》网站刊登纽约大学坦登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和数据科学副教授、负责任人工智能中心主任朱莉娅·斯托亚诺维奇（Julia Stoyanovich）的文章《国会需要在 2024 年解决人工智能的三个紧急危险信号》，呼吁国会在 2024 年积极应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三个紧急问题。文章对美国政府包括人工智能行政令在内的应对措施持肯定态度，但也表示全面立法仍需时间，国会应在 2024 年优先在三个领域做出应对。一是立法应强制人工智能使用透明化，首先从联邦政府实体开始。公众有权知晓算法在招聘和就业、

教育、住房、信贷、贷款和医疗等方面的影响，允许集体风险监测，且人工智能供应商应解释系统目标并记录其有效性。此外，国会应制定透明化标准可被理解的披露要求。二是国会应对人工智能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全面调查。人工智能目前所需的计算能力已产生比航空业更多的碳排放，国会应量化其端到端的环境足迹，并将这些信息纳入税收系统，从经济上抑制不必要或无效的人工智能使用。三是国会应大幅增加对负责任人工智能的研究、教育和培训的联邦投资。仅依靠科技巨头自我监管是不够的，应允许跨学科的研究人员评估人工智能系统中的偏见，发展增强公平性的技术，并建立能经得起客观科学审查的最佳实践，同时保障公民知情权。此外，资金来源可以考虑征收高影响力人工智能税。

<https://thehill.com/opinion/technology/4373850-three-urgent-ai-red-flags-for-congress-to-address-in-2024/>

编译：李一磊

5、联合国：重视数据扩充工作者，走向以人为本的 AI 发展模式

12 月 22 日，联合国网站刊登美国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Partnership on AI 人工智能、劳工和经济项目负责人索南·金达尔（Sonam Jindal）撰写的文章《重视数据扩充工作者：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开发方法的案例》。文章提出以人为中心的 AI 发展模式，强调了 AI 行业中数据扩充工作者的重要

性。人工智能模型的学习源于人类在 AI 模型开发过程中的判断、意见和活动，由此产生的数据需进行分类、标记、注释、丰富和验证。这项任务由全球数百万的数据扩充工作者完成。然而，虽然这些数据扩充工作者在推动 AI 进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的待遇却被严重低估。大部分此类工作在低收入国家完成，这促使了更泛的外包趋势。为构建更加公平的 AI 经济和社会，文章呼吁 AI 行业不仅需要关注“获取数据”，更需要关注“创建数据集”。只有通过重视数据工作的贡献，才能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经济体系，使更多人从 AI 发展中受益。最后，文章强调需要加强对 AI 开发方式的监督，呼吁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倡导者、行业从业者等关键利益相关者在确保 AI 技术带来的好处公平分配方面发挥作用。文章认为，更广泛地肯定数据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关注 AI 开发过程，有助于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有益于全社会的 AI 发展模式。

<https://www.un.org/en/un-chronicle/valuing-data-enrichment-workers-case-human-centric-approach-ai-development>

编译：石佳怡

6、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次国家层面人工智能的政策实践

12 月 12 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刊登该机构地缘政治与全球挑战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伊恩·克劳斯

（Ian Klaus）与加州卡内基基金会顾问本·波尔斯基（Ben Polsky）的分析文章《次国家层面人工智能的政策实践：一份工作指南》。文章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对民众生活产生切实影响，次国家层面司法管辖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人工智能的政策制定中。次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者在制定人工智能政策时，着重考虑技术风险与公民权利。文章概述了次国家层面人工智能政策的四个目标，包括：第一，提高政府效率，提升公众对政府信任；第二，促进公平与信息公开透明，防止人工智能使用中的歧视；第三，影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与模型或应用程序提供商建立可预测、可管控的合作；第四，将地区定位为有助于人工智能发展，提供相关机会的理想地点。文章指出，次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者在国家或国际政策框架的指导下，促进地方进行政策实践。如中美英、欧盟等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人工智能战略、行政令、法案对各地方政策制定的指导作用。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与市民的广泛接触、收集反馈，创建风险评估机制与外部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对现有政策进行完善，并进一步对国家或国际政策框架产生影响。展望未来，文章强调次国家政府在人工智能政策制定的多样性与试验性，并提出需要建立新兴平台或政策框架，让次国家层面的经验参与到全球人工智能政策制定中。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3/12/12/subnational-practices-in-ai-policy-working-guide-pub-91186>

编译：赵金钰

7、《报业辛迪加》：受到攻击的法治

12月27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西班牙前外交部长安娜·帕拉西奥(Ana Palacio)的文章《受到攻击的法治》。文章分析了全球秩序现状。首先，今年以来，世界冲突和混乱频发，二战后建立的全球秩序面临威胁。尽管现存的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其以自由价值观为基础，仍有相当的价值。随着目前自由价值观受到冲击，该体系岌岌可危。其次，目前主要有三种力量对全球秩序构成威胁。一是专制主义。根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数据，2020年有73个国家的“世界自由度”得分下降，只有28个国家得分上升。二是神权。穆斯林国家大多在其法律框架中提及伊斯兰教法，但伊斯兰教法与西方制度中规定的一些基本权利相抵触；且由于这些国家政教合一，法律无法得到独立裁决。因此，这些国家遵守和适用法治的能力必然受限。三是极化问题。该因素在西方国家中尤为突出，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在美国，宪法赋予言论自由权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某些热点问题被赋予某种道德主义性质，因而无法进行有意义的辩论。最后，文章总结称，在过去75年支撑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中，法治显得尤为重要。没有它，就没有民主、人权或国际合作。如果国际社会任由法治进一步恶化，战后国际秩序的萎靡必将加深。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uthoritarianism-theocracy-and-polarization-undermine-the-rule-of-law-by-ana-palacio-2023-12>

编译：叶如静

8、《政客》网站：德国和欧盟面临新的三难困境

12月27日，《政客》网站发布高级分析师米格尔·奥特罗·伊格莱西亚斯（Miguel Otero-Iglesias）的文章《德国和欧盟面临新的三难困境》。作者指出，绿色转型和经济安全可以相互助益，形成良性循环。欧盟面临实现绿色转型、保障经济安全和完善财政监管的三重困境。尽管当前德国专注整肃财政，限制预算赤字，并于11月作出不利于绿色转型融资的裁决，但这种选择是一种战略错误。三重困境在于，一是数据表明，无论对欧洲还是全球，绿色转型都是必要的，然而相对较快的转变需要付出代价；二是如果分配不公平，宏观经济调整会造成社会或政治动荡，许多极右翼政党已经对绿色新政颇有微词；三是在大国竞争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欧盟不得不加强经济安全，致力于政府主导下的“去风险”和产业回流。欧盟及其成员国提出“保护和增强工业能力”的新口号，新的产业政策意味着更大成本，因此，这最后一重困境体现在欧盟各国目前进行的未来财政新规谈判过程中，其中德国尤其赞成针对具体国家调整财政。作者认为，与欧盟不同的是，美国决心追求前两个目标——绿色转型和

经济安全，目前来看似乎美国略胜一筹。未来欧盟需要制定欧洲工业与技术战略，利用核心资源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多投入公共产品以应对气候变化、地缘政治风险和经济压力。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ursula-von-der-leyen-olaf-scholz-germany-and-eu-face-a-new-trilemma/>

编译：杨奕萌

9、《外交政策》：以色列对哈马斯战争的未来回眸

12月26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丹尼尔·拜曼（Daniel Byman）的文章《以色列对哈马斯战争的未来回眸》。文章通过假想巴以冲突持续两年后的场景，指出了以色列将会面临的一系列包括在军事上定义“胜利”的困难、在战争与治理间的过渡失败、以及维护与美国等国际伙伴关系的诸多挑战。首先，文章强调哈马斯在加沙地带拥有深厚根基并对当地民众有着广泛影响力，尽管以色列可能在军事上取得一些成功，但哈马斯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实体的存在很难被完全根除，这点在当以色列试图从战争状态过渡到治理加沙地带时将尤为明显。其次，文章进一步预测，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和对民间伤亡的处理将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批评，这也会加剧以色列在全球舞台上的孤立，而同时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某些政策可能进一步加剧以色列国内宗教

与世俗社区、不同族群之间的内部分裂。最后，文章警告以色列必须审慎处理与真主党的关系。因为真主党拥有的强大军事能力和广泛支持基础将对以色列构成巨大威胁，美国敦促以色列保持克制，与真主党爆发全面战争将给以色列带来灾难性后果。文章建议以色列缩减其战略目标以安抚人民并为长期规划做好准备，认识到其不能永远处于战争状态，同时必须保持好与美国的关系。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12/26/a-future-look-back-at-israel-war-on-hamas/>

编译：朱凯泽

10、美国兰德公司：停火不符合以色列的战略利益

12月26日，美国兰德公司在其网站刊登其空军战略与条令项目主任拉斐尔·科恩（Raphael Cohen）所撰文章《停火的麻烦》。文章指出，国际社会的停火呼吁无法促使以色列改变当前战略攻势。首先，受到国家内部政治分裂、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和国家安全等因素限制，停火并不符合以色列国家利益；其次，停火甚至有可能产生不良影响。以色列希望迅速根除哈马斯，以杜绝后患。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时，以色列很难克制其军事行动；最后，即使停火呼吁得到响应，以色列未来仍将继续加固加沙地带的边界，建设围墙、障碍物甚至雷区，持续打击哈马斯，从而扼杀加沙地带经济复苏的可能。上述行为或将为另一场更血腥的“加沙战

争”埋下伏笔。国际社会应迫使以色列更精确地使用武力，避免平民伤亡，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在战争结束后第一时间与以色列对话，促进巴以冲突的解决。停火方案的问题在于，它只是解决持久战争问题的短期方案，国际社会必须设法确保加沙地带的持久和平。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3/12/the-trouble-with-a-cease-fire.html>

编译：谭燕楠

11、《报业辛迪加》：全球经济稳定的最大威胁

12月27日，《报业辛迪加》发布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的评论《全球经济稳定的最大威胁》。巴苏指出，虽然目前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可能不会像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对全球产生直接影响，但其长期影响是深远的，国际社会有必要立即进行干预，以防止局势失控。通过回顾第20届国际经济协会（IEA）世界大会的讨论，作者认为，会议上一些经济学家对2024年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可能是错误的，积极的经济预期可归因于其倾向于关注富裕国家，更细致的分析则可洞见更黯淡的世界经济发展前景。作者认为，首先，与2008年经济危机不同，当今全球经济稳定的最大威胁来自发展中国家。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庞大的公共支出使得数十个中等和低收入国家陷入债务困境或面临高风险。世界银行最新的国际债务报告

显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打击最为严重却最被忽视，国际社会有必要进行紧急干预。其次，虽然当前危机可能不会像 2008 年美国次债危机那样对全球产生直接影响，但其潜在的长期影响可能是深远的。而这可能会加剧移民危机，进一步助长发达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最后，作者呼吁，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需要的不仅仅是尖端研究，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必须在局势失控之前采取行动。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biggest-threats-to-2024-economic-outlook-by-kaushik-basu-2023-12>

编译：来瑛

编译：叶如静、杨奕萌、朱凯泽、来瑛、谭燕楠、刘嘉雯、石佳怡、赵金钰、和怡然、高隆绪、李一磊

审核：贺刚、申青青、张丁、郑乐锋